

美国黑人母亲的身份变迁

——基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

孙 麟

内容提要 在黑人传统文化中,母亲身份备受尊敬和推崇,代表着爱和成熟。自美国奴隶制时期以来,大多数美国黑人母亲却在白人的奴役和欺压下被归入“不负责任的母亲”和“不称职的家长”之列。长期以来,她们的形象遭到白人的丑化,被贴上了“阿姨”、“女家长”,“福利妈妈”和“婊子娘”的标签。以黑人女性主义的视角观照历经诸多演变的黑人母亲身份标签,可以辨析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压迫,厘析黑人母亲身份中蕴含的独立、平等、拥有领导力的内涵。论文以黑人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为研究路径和方法,运用黑人女性主义理论考察了黑人母亲身份从公元8—16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到美国民权运动后的动态发展脉络,同时也解构和重建了黑人母亲身份的内涵特质。

关键词 黑人 黑人母亲 美国 黑人女性主义

从古至今,黑人母亲身份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远古非洲的神话意象中,大地被誉为孕育万物的母性神灵,非洲大陆被称作“非洲母地”。^①由于黑人母亲既承担着生儿育女的重任,也担负着整个社区和族群的精神、文化教养的职责,在黑人文化中,她们拥有至高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地位,不尊重母亲就相当于亵渎神灵。被迫来到美洲大陆后,黑人母亲在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歧视的多重压迫之下依然是非洲大陆的最坚定、最可靠的坚守者,其身份呈现“‘肌底’非洲化、‘肌理’美国化”^②的特征。目前国内外学界对黑人母亲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文学、文学批评、社会学领域,关注点包括黑人母亲形象、黑人母亲的主体性、母爱、家庭关系/史等;与黑人母亲身份相关的研究或是从黑人男性的视角分析黑人身份,抑或是运用文学批评理论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厘析黑人女性身份。迄今为止,国内尚无专门采取新文化史、新社会路径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研析黑人母亲身份的论文或著作。然而,要全面地把握黑人母亲身份的内涵特质和动态流变,则必须将黑人母亲置于视角原点和话语中心,采取多种研究路径对其进行批判性解析。

作为女性主义的思想流派之一,黑人女性主义^③和其他白人女性主义一样致力于批判、对抗、

① Cheryl Townsend Gilkes, *If It Wasn't for the Women: Black Women's Experience and Womanist Culture in Church and Communit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1, p.61.

② Norma J. Burgess and Ernestine Brown (eds.),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Falmer Press, 2000, p.2.

③ 早期的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一批接受了良好教育的黑人中产阶级女性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号召黑人女性寻求两性平等和自身解放,但此时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影响甚微。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兴起催发了诸如女性学、黑人研究和黑人女性主义等新的学科领域。20世纪70年代,“康巴希河组织”(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发表《黑人女权主义者声明》(*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标志着现代黑人女性主义的正式形成。现代黑人女性主义将斗争矛头指向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旨在建立集体身份认同,争取群体的合法权利。20世纪90年代起,受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后现代黑人女性主义应运而生,着眼于个体身份的确立和延伸,更加关注黑人女性的内心需求,从而实现自我解放、自我赋权。

改变在公共及私人领域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和性别等级制度,^①进而唤起个人主体意识、建立集体身份认同,最终诉诸行动改变现状。但是,种族的不同、阶级的差异使黑人女性主义和白人女性主义在出发点和关注点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白人女性主义从中产阶级女性的立场出发,着眼于已解决生存问题的女性在“发展”方面的问题,如自由权利在堕胎上的运用、与男性同等的职业发展权利;黑人女性主义是从多数处于工人阶层的黑人女性的视角出发,关注与黑人女性生存息息相关的种族主义问题、黑人贫困问题、黑人家庭模式,如:与白人同等的就业、教育机会,消除带有种族歧视的住房、福利制度以及母亲角色常常高于父亲的养育方式。当前,黑人女性主义思想内涵大致可分为:第一,挖掘被隐匿的、沉默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第二,重构被他者化、妖魔化的黑人女性形象。重建黑人女性的自尊、自立、自强、拥有主体意识的形象;追溯女性不断延展的自我身份和不断加强的社会行动力,挖掘其身份特质;第三,改善并加强黑人女性之间、黑人女性与周围社会生态圈(家庭、社区、社会)之间的联结、互助和凝聚;第四,反对多重共时交错性压迫(种族主义、阶级、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及其产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根源,重新认识和诠释美国黑人女性在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等基础上的多重身份、多样处境和多元诉求。^②以此为理论基石,本文将以往“被失语”的黑人母亲引入话语中心,从黑人文化史和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她们从西非古国时期(公元8—16世纪)至现代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经历,运用黑人女性主义理论解析这些经历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深入挖掘黑人母亲身份的内涵特征,揭示其衍变轨迹与发展脉络,从而全面地审视、批判地解读美国社会文化的演变、人文精神的成长。

一、西非古国时期(公元8—16世纪)

公元8—16世纪西非社会的黑人女性兼有多重身份:母亲、妻子、姐妹、商人、政治参与者或领导者、祭司。由于女性生儿育女的能力无可取代,母亲身份自然而然地成为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身份。经济上,黑人母亲努力工作,获得经济独立;政治上,她们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行使政治权利,享有较大的政治参与度和独立的发言权;在宗教事务和文化遗产方面,她们拥有独立自主的领导力,传承着整个族群的传统、历史和信仰。此时的黑人母亲身份中天然蕴含着独立平等的因素:不仅有身体的自主权,也有经济、思想的独立性;既有家庭分工的平等,也有社会地位的对等。

日常生活中,黑人女性的最大使命是生儿育女,故而早婚现象非常普遍,女孩在十几岁甚至更早便结婚,出现了许多少女妈妈。^③她们生育的孩子越多,社会地位就越高,而无法生育的女性则受到冷落从而被边缘化。^④妻子的功能从属于母亲的职责,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到怀孕,然后回娘家生产。小孩三岁时,她再回到夫家生活直至再次怀孕。由于两个孩子的生育间隔时间比较充足,母亲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照料,甚至有些溺爱他们,而她的身体也可以在生育后得到完全恢复。^⑤非洲有句谚语叫“举全村之力抚养孩子”(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这里的“村”指的是族群部落或黑人村落,整句谚语的意思是集中整个族群的人力物力来抚养教育孩子。当黑人女性成为人母却无法尽母亲责任的时候,“全村”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帮忙看管照顾孩子。可以看到,黑人女性生育子女的能力和抚养后代的行为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和保护。

^① 详见 Andrea G. Hunter and Sherrill L. Sellers, “Feminist Attitude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nd Men”, *Gender and Society*, vol. 12, no. 1, 1998, p. 81.

^② 详见稽敏:《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视域下的女性书写》,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75、125、235—236页。

^③ 艾周昌、沐涛:《走进黑非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④ Joyce A. Ladner, *Tomorrow's Tomorrow: The Black Wom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p. 22.

^⑤ La Frances Rodgers-Rose (eds.), *The Black Woman*,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0, p. 16.

家庭生活中,两性的经济职责清晰,分工明确。一般而言,男性负责狩猎,女性承担食物的采集和搬运。进行农业生产时,男女共同种植农产品。除此之外,地处沿海的西非地区商贸发达,因此,这里的黑人女性除履行前文提及的家庭职责外,还善于“因地制宜”地做些小买卖。一方面,她们在市场上出售家庭多余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她们“掌握着一些行业技能,如制作和销售布匹、陶器、纺织品,销售其他各类产品。”^①这些贸易活动为西非女性带来独立的家庭经济地位,并赢得商业市场上的一席之地。但和男性不同的是,当女性外出劳作或经商却找不到他人代为看管孩子之时,她们必须“将年幼的孩子扛在肩上,再带上大孩子”,^②一起外出工作。所以,黑人母亲如果要在外工作,必须首先尽到母亲的责任,保证自己的孩子得到安全妥帖的照顾。

独立平等的经济基础奠定了黑人母亲在政治上的参与和决策权。尽管西非古国时期大部分西非国家为父系社会,西非的黑人母亲仍然是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和决策者,因为当时社会上实行“两性平等参与的政治制度”(dual sex political system),^③又称“两性平行领导的政治制度”(parallel leadership)。^④例如,在尼日利亚的伊博族(Igbo)和约鲁巴族(Yoruba)有“奥母”(omu)和“爱雅洛德”(Iyalode),即被地处加纳和塞拉利昂的部落称为“王母”(Queen Mother)的女性领袖。她既非王子的母亲,也非国王的妻子,而是“根据能力和威望,从亲近的王室成员中遴选出来的”^⑤女性国王或首领,专门处理与女性利益相关的事务如夫妻矛盾、子女教养,监管部落的经济活动,监督男性国王执政,甚至可以在男性国王失职的情况下,提出废黜国王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行使政治权,“王母”会从各个部落中选拔才能和表现突出的女性,任命她们为“与男性官员的职责对应的女性官员”,组建自己的女性内阁和智囊团,这些女性官员通常被称作男性官员的“母亲”,地位高于他并且可以监督他的工作”。^⑥黑人母亲享有政治威望,拥有政治话语权,以及男女共同治理国家的政治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政治地位保障了黑人母亲崇高的宗教领导权和文化传承力。主持宗教仪式的祭司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女祭司往往负责与主宰生育的神有关的宗教活动。^⑦女祭司通常由生育过的年长母亲担任,她们在族群中颇受尊重,通过主持宗教活动和仪式,将宗教传统和信仰传递给下一代,并致力以宗教活动来服务族群,从精神上满足整个族群的需要。即使没有担任女祭司,黑人母亲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向族人讲述部落的传统和历史,为族群提供精神养分和信念动力。例如,她们会在“村”里教育所有未成年的黑人女性,让女孩学习和了解自己在未来承担的职责,从而使黑人的传统和价值观传递代代相传。^⑧这样的话,整个族群的凝聚力得到很高的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获得极大的丰富。同时,黑人母亲在宗教和文化中的显要领导位置又进一步加大了自身的经济和政治位置,在社会上博得更为尊贵的地位。

公元8—16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的黑人母亲在家庭和各个领域都拥有崇高和神圣的地位。她们有充足的自由和精力悉心养育子女,教养族群,母子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石。除了孕

① La Frances Rodgers-Rose (eds.), *The Black Woman*, p.16.

② Leith Mullings, “Wome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frica”, in Nancy J.Hafkin and Edna G.Bay (eds.), *Women in Africa: Stud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253.

③ Kamene Okonjo, “The Dual Sex Political System in Operation: Igbo Women and Community Politics in Midwestern Nigeria”, in Nancy J. Hafkin and Edna G.Bay (eds.), *Women in Africa: Studi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45.

④ Filomina Chioma Steady, *Women and Leadership in West Africa: Mothering the Nation and Humanizing the Stat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222.

⑤ 孙丽华、穆育枫:《非洲部落文化纵览》(第一辑),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第46页。

⑥ August Meier and Elliott Rudwick, *From Plantation to Ghetto*,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6, p.14.

⑦ La Frances Rodgers-Rose (eds.), *The Black Woman*, p.197.

⑧ Patricia H.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192.

育生命和教养子女,她们和男子一样“撑起半边天”,既进行家庭劳作也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此时的黑人母亲身份表现为独立、平等、且表现出一定的领导力。

二、美国奴隶制时期(1619—1865)

来到美洲大陆新世界,黑人被视为“野蛮的”异类、“非人的”财产,他们的劳动力被剥削,相应的权利、自由和尊严被剥夺,而黑人母亲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此时的母亲身份仍然作为黑人社会中最重要身份,但在白人社会,其神圣性遭遇极大的践踏,文化形象遭到强烈的扭曲,沦为中性的胖“阿姨”(mammy),没有感情的“强势的黑妈妈”(strong black mother),淫荡和堕落的“耶洗别”(jezebel)。^①生存的需要迫使黑奴母亲在种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环境下继续辛勤地劳作,为白人主人创造生产价值、提供生活服务;在此处境中,她们顽强地反抗种族、阶级压迫,维系亲子关系,维持家庭和族群的发展。

殖民地弗吉尼亚于1662年制定的法律,奴隶是主人的财产,子女继承黑奴母亲的奴隶身份。这就意味着奴隶生育的子女越多,主人的财产便越丰厚。于是,一旦到了生养的年纪,黑人女性就会按照主人的安排去怀孕生子,有的甚至一年生一个孩子。这样,之前隔三年怀孕的生育节奏全部被打破,很多人还没从上一次生产中恢复,又要立即准备下一次怀孕生子。一般来说,在新生儿出世后,黑奴母亲休息两周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回到田间地头从事繁重的农活。孩子一岁后,母亲将孩子交给“村”里的“母亲们”或“姐妹们”看管,自己在外做事。^②显然,奴隶制改变了黑人家庭正常的生养秩序、阻碍了紧密的母子联系,随着生育速度的加快和养育孩子数目的增加,黑奴母亲无法像西非古国时的黑人母亲一样全面周到地照顾孩子,孩子的健康状况与之前相比大大下降。

即便如此,黑奴母亲依然尽其所能地关爱孩子。一天劳作回家后,她们继续做饭、缝纫、洗衣、与孩子交流,用族群的价值观和先辈的故事影响下一代。当黑人男子被贩卖到其他地方或被虐致死时,黑人奴隶家庭经常被拆散,黑奴母亲因此便独自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当骨肉被迫分离时,她们会想方设法地看望或找回自己的孩子。据黑人废奴主义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所述,在他的母亲被卖到另一个种植园后,她走了12英里的夜路来看他,第二天日出前又走回自己的住处。^③废奴主义者、妇女权利活动家索杰纳·储斯(Sojourner Truth)曾是个奴隶,她在1851年俄亥俄州妇女权利大会上痛声呐喊道:“我已经生了13个孩子,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被卖掉,当我用母亲的悲痛大声疾呼时,只有主能听到我的声音。难道我不是个女人么?”^④她去法院起诉卖掉自己儿子的奴隶主,救回了儿子。还有一些黑奴母亲宁可选择自杀、流产,也不愿看到必然的骨肉分离。一位奴隶回忆道:“我母亲告诉我,他(奴隶主)的黑人女奴有七个孩子,每到孩子一两岁的时候,他就把孩子卖了。她对此心痛不已却无能为力。在第四个孩子长到两岁时,她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主人的行为,……她从瓶子里取了些东西喂给孩子,一会儿孩子就死了。”^⑤事实上,这种“狠心”是走投无路的母亲在极端情况下保护孩子免受分离和奴役的无奈之举。从黑人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奴隶制下的种族压迫、生存压力、家庭破碎的现实让黑奴母亲的目光

① 出自《旧约·列王记下》。“耶洗别”是列王亚哈(约公元前874—853年)的妻子,以残忍歹毒、放荡无耻著称。这里用来指荡妇。

② Joyce A. Ladner, *Tomorrow's Tomorrow: The Black Woman*, p.18.

③ Benjamin Quarles (eds.),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35-36.

④ 选自19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索杰纳·储斯(Sojourner Truth)于1851年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举行的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的演说《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Ain't I a Woman?*)

⑤ Lou Smith and B.A. Botkin (eds.), *Lay My Burden Down: A Folk History of Slav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p.40.

天然聚焦在种族、阶级、家庭问题上,黑奴母亲们在黑人男性缺失的情况下独自挑起养孩重任、骨肉分离之时尽其所能守护亲子关系的努力既是对母性天性、家庭族群的坚守,也是对奴隶制的奋力反击。

沦为奴隶主的财产后,黑奴母亲彻底失去了经济独立权和政治话语权,被贴上了丑陋的身份标签。但是,如果以黑人女性主义思想透析这些标签,我们会发现,中性的胖“阿姨”实际上指的是那些起早贪黑帮助主人做家务、照顾少爷、小姐的勤劳的黑人女性;没有感情的“强势的黑妈妈”是那部分在丈夫死后或被转卖后独立养家的坚强的黑人母亲;而淫荡和堕落的“耶洗别”恰恰是惨遭主人的性侵和性虐而被迫不停地生育的暴力受害者。实际上,这些被丑化的身份标签是白人统治阶级种族歧视的产物,也成为他们延续奴隶制、压迫黑人种族的借口。值得注意的是,在极度不平等的大环境下,“黑人女性却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与西非母辈同样的两性平等”^①——黑人女性和男性同属无产者,“遭受着同样的痛苦,有着同等的社会地位,也怀着同样的热情来反抗奴隶制。这成了奴隶制最为讽刺的一点,……使女性在反抗奴隶制的过程中获得了性别上的平等和独立。”^②举例而言,奴隶主会以减少工作量、发赏金等“丰厚条件”诱使黑人女性多生孩子,而部分黑奴母亲洞悉这一点后,就与奴隶主斗智斗勇,利用自己的生育能力来获取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争取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机会。再比如,黑人女性会同黑人男性一起创建一个抚慰心灵、团结思想、独立于并对抗不利大环境的黑人族群“小生境”。在这里,黑人母亲在西非古国时期的传统身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传承,她们领导和参与黑人教堂活动,运用黑人族群的集体关爱和相互扶助取得精神联结、排解负面情绪,并“将努力工作、坚韧、自立、顽强、反抗、坚持性别平等的新型女性身份标准传递给后辈女性”。^③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可以看出,尽管黑人母亲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遭受歧视、背负污名,她们仍然拥有积极的主体身份意识,为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维系家庭和凝聚族群、对抗种族和阶级压迫做出巨大的贡献。简而言之,美国奴隶制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致使黑人母亲身份中原有的独立性、平等权、领导力遭大幅度缩减,但黑人母亲依然在自己的族群中部分保留了西非古国时期独立、平等、有领导力的身份传统。虽然白人社会的压迫导致黑人母亲之前的经济、政治、宗教自主权和领导力彻底丧失,但是她们依旧保持着独立坚强的个性,关爱、教养后辈,与黑人男性并肩工作,共同反抗种族压迫、阶级压迫。

三、南北战争后到民权运动期间(1865—1968)

南北战争后,黑人母亲逐渐恢复了人身自由和生育自由,生育子女的平均数目由之前的七个降为四个,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孩子被卖走,黑人家庭关系比之前更为稳固。^④经济、政治上而言,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仍旧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底层,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没有多少自主权。通常,黑人男性的工作不稳定且收入不高,因而黑人女性继续在外工作养家或补贴家用。在黑人族群里,黑人母亲的身份仍然受到尊敬,母子关系依然超过其他社会关系;但白人社会不仅固化了美国奴隶制时期黑奴母亲的负面形象,还给黑人母亲贴上了诸如“不称职的母亲”(bad mother)或“不负责任或不计后果的繁殖者”(irresponsible or reckless breeders)等新的身份标签。^⑤

以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为指导反观这些身份标签,我们可以抓住其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缘由。19世纪晚期,受维多利亚风潮的影响,社会普遍认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女性,就应该在“妇女的领

① Deborah Gray White, *Ain't I a Woman? Female Slaves in the Plantation South*, New York: Norton, 1985, p.22.

② Angela Y.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p.23.

③ Filomina Chioma Steady, *Women and Leadership in West Africa: Mothering the Nation and Humanizing the State*, p.25.

④ La Frances Rodgers-Rose (eds.), *The Black Woman*, p.22.

⑤ Shirley A. Hill, *Black Intimacies: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2005, p.122.

域”(the woman's sphere)中有所作为,保持虔诚、纯洁、顺从、持家的品质。而成为一位好母亲,不仅需要具备这些品质,还要进行全天候“科学化的母性教养”(scientific mothering),即用“专业的科学和医学建议来保证孩子健康的成长”。^①以此为标准,任何偏离这些要求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②尽管一些黑人母亲曾试图达到这个社会标准,然而严酷的现实却彻底粉碎了她们追随白人持家风潮的梦想。首先,美国奴隶制结束后,黑人男性难以就业又容易失业,可是黑人女性能够找到低技术含量、更低收入的工作,工作机会相对比较充裕。其次,南北战争后颁布的《黑人法典》规定黑人妇女儿童必须留在种植园工作,待在家中的黑人女性则被看做“无所事事”,“装淑女”,“闲散”和“懒惰”。^③于是,种族、阶级压迫带来的家庭经济困境和养育重担把她们推入劳动大军的行列。有数据显示,1900年,全部黑人妇女的43%在外面工作,而土生土长的白人妇女只占15%。^④大部分工作的黑人女性从事佃农制下的农业生产或家政工作,工作的强度丝毫不弱于奴隶制时期。工作时,她们的孩子只能交由族群里的“姐妹们”或“母亲们”代为看管。这样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主流的社会政治体制导致黑人母亲在外工作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又是这些主流价值观反过来厉声斥责黑人母亲“不称职”或“不负责任”。

就在这个阶段,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家境殷实、意识觉醒的黑人中产阶级女性掀起了第一次黑人女性主义浪潮,她们领导了黑人女性俱乐部运动(the Black Women's Club Movement),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通过提升黑人女性的道德水平和社会觉悟来改善整个民族和社区的公共福祉。思想上,她们充分认识到女性尤其是母亲身份的力量:一方面,这种身份决定了孩子的教养和种族的未来,是“造物主赐予女性的一处美妙的圣地”,如果“女性逃避这个责任,就错失了为自己为人类发展奉献的机会,也剥夺了女性身份最美好的一个优势”,^⑤所以要将母亲身份还原到西非古国时期崇高神圣的位置;另一方面,母亲身份包含“对家庭、职业和社会运动三重义务”^⑥故而既要优生优育,又要在外工作,同时还要领导或参与改变本民族境遇的社会运动。她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譬如,黑人女性主义者、黑人民权运动早期领导者艾达·B·韦尔斯(Ida B. Wells)在发表政治演讲的活动中仍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黑人女性主义者、全国有色人种妇女协会领导人玛丽·丘奇·特雷尔(Mary Church Terrell)既生养了子女,也收养了孩子,并且坚持边工作边照顾孩子。此外,她们针对大部分黑人女性没有或较少接受过教育的情况,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提高黑人母亲们的教育程度,并定期举行母亲间的聚会、教堂活动,交流抚养孩子和社会工作的经验。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优生主义者和白人女性主义者呼吁“种族弱势群体”(缺乏产前护理和足够教育的少数民族妇女)实行计划生育,但是黑人母亲仍然坚持本民族的生育传统,延续种族的血脉和文化。实质上,这些既是对西非古国时期母亲身份原型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主流社会扭曲黑人母亲身份的有力回击。从黑人女性主义角度看,可以说,这次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黑人女性从黑人传统文化和自身身份中汲取力量,加强黑人姐妹情谊和黑人社区集体认同,以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对抗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压迫,但是我们仍然应当看到,这些黑人女性主义先驱们塑造的母亲身份受到父权制思想影响且从属于民族事业的

^① Rima D. Apple, “Constructing Mothers: 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vol. 8, no.2, 1995.

^② Andrea O'Reilly (ed.), *Feminist Motheri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p.10.

^③ Bart Landry, *Black Working Wives: Pioneers of the American Family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42.

^④ 洛伊斯班纳著,侯文惠译:《现代美国妇女》,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53—54页。

^⑤ Alfreda M. Duster (ed.), *Crusade for justice: The Autobiography of Ida B. Wel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251.

^⑥ Bart Landry, *Black Working Wives: Pioneers of the American Family Revolution*, p.72.

需要,“把广泛的社区利益凌驾在性别的利益之上”,^①因而并未突出黑人母亲的领导力、黑人女性群体和个体的独立诉求。

概而言之,奴隶制结束后,在主流社会里,黑人母亲享受独立、平等、领导力的范围和自主程度相比奴隶制时期有所改观,但与白人相比,她们的经济、政治独立权和领导力依然非常单薄,也继续遭受着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形象遭到扭曲。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窥见,在黑人族群中,黑人中产阶级女性开始觉醒和崛起,力求还原母亲身份的神圣性并重获母亲在政治和社会事务上的领导力。主内又主外的重担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促使她们独立且坚强,既养家持家,又追求平等,反抗种族、阶级压迫,坚持不懈。

四、民权运动后至今(1969—)

民权运动后,《民权法案》和《权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黑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赋予了黑人一定的政治权。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以及政府种族保守政策的推行,很多黑人男性失去了工作,黑人女性则挑起生活的大梁。同时,黑人族群内部的阶级差异扩大,阶级分化加剧:获得良好教育和工作机会的黑人有望跻身上层,而失去工作或从事低端工作的人群往往落入低收入阶层。^②在这一时期,黑人母亲“有些被称为女家长、母夜叉和性感辣妈;有些被称为姐妹,美眉,阿姨,老妈子和小姑娘;有些则被称为未婚妈妈,坐享福利者和市区败家娘儿们。”^③

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从阶级、性别、种族、性取向等多重维度解构了被妖魔化的黑人母亲身份,帮助我们反思和洞悉这些有色标签的实质。“新时代黑人阿姨”(modern mammy)是美国奴隶制时期“阿姨”形象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发展应用,指的是黑人中产阶级职业女性,“一边为白人统治者服务,一边管理她的族群同类”,^④她们对白人“主子”毕恭毕敬,对自己的同胞颐使气指。显而易见,这个称呼动摇了黑人女性独立的自我身份,也破坏了黑人社群的内部团结。“女家长”是美国奴隶制时期“强势的黑妈妈”形象的变体和延伸,她咄咄逼人、太过强势,导致丈夫和儿子阳刚不足,甚至还抢了黑人男性的饭碗。这个标签使黑人母亲成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替罪羊。^⑤事实上,后工业时代的重组造成农业、手工业领域的工作机会锐减;白人的对抗政策使失业的黑人男子增多,大多数黑人女性做的是黑人男子无法从事或不愿从事的低收入工作。“福利妈妈”(welfare mother)是“不负责任或不计后果的繁殖者”在新时代的延续。在白人看来,“福利妈妈”和“女家长”都是不称职的母亲,她们好吃懒做,坐享其成,还会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不良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应该注意到的是,首先,这一时期工作机会的缩减和工作要求的提高致使没有或较少受过教育的黑人母亲很难就业也很容易失业。据统计,1972年以来,黑人妇女的失业率是白人妇女的两倍。^⑥其次,即使不外出工作,她们也照顾自己的和亲朋的孩子,并非无所事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福利妈妈”是白人统治阶层用来削减政府福利的口实。在荡妇“耶洗别”形象的基础上,社会上又出现了“性感辣妈”(hot momma)或“婊子娘”(hoochie mama)的称谓。它们指涉生活在贫民

① 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② Patricia H.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pp.65-67.

③ Trudier Harris, *From Mammies to Militants: Domesticity in 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

④ Barbara Omolade, *The Rising Song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55.

⑤ Patricia H.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pp.82-85.

⑥ Jennifer Hamer and Helen Neville, “Revolutionary Black Feminism: Toward a Theory of Unity and Liberations”, *Black Scholar*, vol. 28, no.3-4, 1998.

区、用放荡和古怪的性行为(和男性一样有强烈的性欲望,并渴望和其他女性发生性关系)做性交易并借此维持家庭生计的单身黑人母亲。^①这类黑人女性在世人眼里同样是不负责任的母亲,不能为后代提供健康向上的教育。其实,这样的描述将黑人女性客体化为提供性满足的他者,放大了其中性欲和放荡的意味。不难看出,这些标签都将歧视的目光聚焦在黑人母亲的生育能力、性能力、家庭角色和社会责任上,“阿姨”和“女家长”皆阳刚有余、极具女汉子特质,能力很强却不能维系好自己的小家庭,也不能为本民族的发展做贡献,“福利妈妈”和“性感辣妈”则凸显黑人女性旺盛的生育能力和乖张的性行为,对自己的孩子不负责任,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它们共同反映了黑人母亲在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层面所遭受的共时交错性压迫和歧视。

在解构被他者化的黑人母亲身份的同时,黑人女性主义又建构了符合黑人母亲实际的身份。重构过程从自我身份和社会行动两方面入手,通过黑人母亲与其他黑人女性、黑人小孩、黑人社群的互动,围绕着解决种族歧视、生活贫困、家庭和族群教养等现实问题进行。就自我身份而言,首先,黑人女性主义主张思考和确认自我身份,解放和树立自我意识,换言之,就是将各种社会身份剥离,仅明确自己作为一个女人需要什么,作为一个人追求什么,如此一来,黑人母亲才能获得足够强大的思想力量再去引导子女。黑人女性主义者朗妮·奥尼尔·帕克曾举过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当母亲可以买三个球的冰淇淋时,她不用自己吃一个半球、给子女一个半球,而是她自己吃三个球,然后可以给子女分一点。^②其次,挖掘黑人母亲身体里蕴藏的健康的情欲力量,纠正主流社会将黑人母亲的性、生育、情欲与色情等同的歪曲。^③黑人母亲身体里充满积极丰富的情欲力量,这种力量源自于本真的爱,小到人与人之间的情爱,大到对整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被主流社会贬低的所谓低俗的性欲工具和低级的繁殖机器。那么,一旦黑人母亲自我身份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得到确立,自我情感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得以展现,她们就可以增进对自身的了解、与其他黑人女性的相互理解,自然地实现从“我”到“我们”(母亲连同孩子、社群)的过渡,进而更好地建立与外部世界的情感连接,增强整个群体的行动力度,去对抗种族主义、阶级歧视、性别主义、异性恋主义的话语攻击和行为侵袭。此外,从社会行动层面来说,面对多重共识交错性压迫,黑人母亲既运用单亲母亲养育(single mothering)、代位母亲养育(othermothering)^④等不同的养育方式来传递自我、家庭、社群的价值观,又借助如教堂里的女教友服务(church mothering)、^⑤社区中的女社员服务(community mothering)、^⑥大学或其他工作单位里的女导师联系制(mentor mothering)^⑦和女子联谊会机制(sorority mothering)^⑧等社群服务体制来促进黑人子女社会化(child socialization),还领导和参与游行、游说、环境正义运动^⑨等社会运动来保障和维护民族权益,反抗新形式的种族压迫。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进黑人女性间的姐妹情谊,还能够减轻黑人社群内部阶级分化加剧所造成的种族疏离和性别隔阂,从而使黑人社群各阶层的

① Patricia H.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pp.86-92.

② Lonnae O' Neal Parker, *I'm Every Woman: Remixed Stories of Marriage, Motherhood, and Work*, New York: Amistad, 2005, p.94.

③ Audre Lorde, *Sister Outsider*, Trumansburg, N. Y.: Crossing Press, 1984, p.53.

④ 代位母亲养育指的是在单亲母亲或父母双方在养家分身乏术之时形成的一种由女性亲朋分担养孩重任的养育模式。详见 La Frances Rodgers-Rose (ed.), *The Black Woman*, p.72.

⑤ Cheryl Townsend Gilkes, *If It Wasn't for the Women...: Black Women's Experience and Womanist Culture in Church and Community*, p.61.

⑥ Arlene E.Edwards, "Community Moth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ing and the Community Work of Black Women",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on Mothering*, vol.2, no. 2, 2000.

⑦ Lori D.Patton and Shaun R.Harper,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am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 *New Directions for Student Service*, no.104, 2003.

⑧ Greta Hendricks Johnson, African American Sororities, <http://learningtogive.org/papers/paper172.html>

⑨ 环境正义运动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在环境种族主义客观存在的社会背景下,广大少数族裔及低收入人群追求环境权益和责任的公平平等的一场运动。详见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力量在保护族裔后代身心健康成长的共同目标下获得联结和整合,最终,黑人的生活、教育、就业状况取得改善,黑人家庭得到稳固,黑人社群获得巩固。可见,重建的黑人母亲身份不限于对子女的身心照料,也不仅仅是和工作结合,更蕴含着一种独立、平等的力量以及在精神和行动上的引领性。

结 语

总之,美国黑人母亲身份经历了从公元8—16世纪的西非古国时期到美国民权运动后的诸多演变。西非古国时期的黑人母亲身份备受推崇,黑人母亲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重要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宗教地位。当黑人母亲被贩卖到美洲大陆后,原先的身份受到美国社会的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歧视等多重压迫的歪曲和丑化,而黑人女性主义思想解构和重建了黑人母亲身份。运用黑人女性主义视角来考察黑人母亲身份及其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黑人母亲身份的核心内涵包括独立、平等、有领导力。

首先,“独立”表现为母亲身份和工作(家庭劳作和社会工作)的相互结合。非洲的传统文化和美国的生活境遇决定她们自古以来对经济独立的渴求。努力工作——小而言之,挣钱补贴家用;大而论之,承担养家重任。即使因年迈或无法找到工作而留守家中,她们也会照顾自己家里和族群邻里的孩子们。其次,“平等”体现在从西非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男女平等状态到进入北美大陆后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精神和行动。虽然在北美大陆的各历史阶段遭受的压迫有所不同,但黑人母亲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并将其作为传统的重要内容通过精神教养代代相传。最后,“领导力”表现为黑人母亲在非洲大陆的领导传统以及在北美大陆独当一面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尽管囿于时代和环境,领导力的实施范围和影响程度在美国奴隶制时期降到最低限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领导力逐步得到恢复和扩大。

即使黑人母亲的身份曾经并且仍然在北美大陆遭受着极大的贬低和压制,但还是逐渐恢复本我并显现自身蕴藏的内涵。无论主流社会怎样歪曲黑人女性的形象,黑人母亲始终在社群中受到尊重,母亲身份一直是文化传统的保鲜剂和社会行动的加速器。她们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信念深深地影响着整个黑人社区,也极大地引领了族群的未来。

Abstract In black culture, motherhood enjoys high respect and much glorification. However, most black mothers have long been discredited as “bad mother” and “unfit parent”, and labeled as “mammy”, “matriarch”, “welfare mother” and “hoochie mama” since the slavery time. Reflecting upon those disfigured labels from a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 could help us to perceive the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s of racism, classism, sexism and heterosexism endured by black women, and dig into the essence of black motherhood embodied in independence, equality and leadership. With Black Cultural History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s its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is paper, mainly from a black feminist perspective, displays a clear and complex picture of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black motherhood from ancient times in West Africa till modern times in America,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its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孙麟,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上海,201620)

[责任编辑:周旭芳]